

06118

内部资料

# 经济资料

第六期

(总第 38 期)

北京大学经济系资料室

一九八二

## 目 录

|                                                       |           |
|-------------------------------------------------------|-----------|
| 《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导论(续)···                                  | 房维中 (1)   |
| 苏联经济改革的几个理论问题·····                                    | 徐淑娟 (23)  |
| 关于试办经济特区的几个问题·····                                    | 李克纲 (44)  |
| 我国吸收外资的方针和概况·····                                     | (63)      |
| 我国就业情况简介·····                                         | (66)      |
| 国内经济界对国民经济中一些问题的<br>各种意见·····                         | (69)      |
| 剩余价值学说是马克思经济理论的<br>基石·····                            | 张秋舫 (77)  |
| 中文报刊中发表过的有关中国经济<br>思想史研究论文篇目<br>索引(1900—1981)(续)····· | 郑学益编 (96) |

# 《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导论

房 维 中

## 第二章 把握中国的国情是评价新中国 经济史的基本准则

### 第一节 经济发展的四个基本经济因素

研究经济史，要研究四个方面的问题。

#### （1）经济理论或经济思想

我们的经济工作是以一定的经济理论作为引导的。过去一个时期，我们的经济理论有正确的部分，也有错误的部分，还有一些属于摇摆不定和不十分清晰的部分。比如对中国的商品生产问题，一时说中国商品生产不能搞，要消灭；一时又强调商品生产在中国没有害处，要发展。1958年毛主席曾批评说：现在有些人大有消灭商品生产之势，没有区别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商品的差别，没有懂得利用其作用的重要性，经济学家不喜欢经济学。到了1976年又批判商品生产，说商品生产要产生资产阶级等等。经济理论上的这种状态对经济工作影响极大。

经济工作中出现的“左”是同经济理论上的“左”密切联系的。我们研究新中国经济史，必须研究每个时期的经济理论，了解它的发展变化以及对经济工作的影响。

## （2）经济政策

有正确的经济理论还必须要有正确的经济政策，即在某个特定时期内根据正确的经济理论和实际情况所制定出来的行动准则。经济政策包含很广泛，各行各业都有经济政策，不是正确的政策，就是错误的政策，或者模模糊糊的政策。大的发展战略也是一种经济政策。由于经济政策对经济活动的关系更直接，因此，经济政策的正确与否对经济工作的成功和失败关系更大。研究经济史应该更多地研究每个时期的经济政策。

## （3）经济计划

经济计划，是根据经济政策和实际的经济条件，对一定时期经济发展所作出的量的规定性。经济计划有长期计划。在企业内又有季度计划和月计划。我们的计划在整个经济活动中间是起很重要的作用。计划订的富有远见而又积极可靠，则经济发展就比较顺利，如果计划订的脱离实际，把指标订高了或把指标订低了，以及指标之间失去平衡，即量的规定性不准确，都会造成经济工作的失误。我们的计划有接近实际的时候，比如第一个五年计划；也有脱离实际的时候，也就是在“左”的理论和“左”的政策指导下，计划指标过高，建设规模搞得过大。象1958年的大跃进，在经济理论、经济政策和经济计划上都有毛病。

## （4）经济体制

经济体制，包括社会主义所有制的结构，即社会主义所有制的形式，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国营经济的管理制度。我们国营经济、集体经济的活动都是在一定的经济体制

的范围内进行的，所以经济体制是否妥善，可以起调动或者束缚各方面积极性的作用。

以上四个因素，都是经济因素。要搞清楚经济史，还必须研究政治因素，也就是政治理论、政治斗争、政治运动对经济的影响。我们过去的经济发展受政治运动的影响太大了。不搞清楚政治运动史，也就搞不清楚经济史。

我们的经济史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社会生产力的运动史，而这种运动都是同上述各项基本因素的正确与失误密切联系着的。因此，我们必须研究这些基本因素。

## 第二节 什么是中国的国情

用什么标准来衡量我们的经济理论、经济政策、经济计划、经济体制是正确还是错误？基本的准则就是看它是否符合中国的国情，即是否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是否按客观可能办事，是否符合客观规律。

中国的国情，也就是中国的实际是什么？概括起来有以下几点：

### 1. 我们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的制度

我们在政治上建立和巩固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在生产关系上建立和发展了社会主义的经济。这是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的一个基本国情。但是这个制度还有很多不完善的地方。我们的任务就是巩固和发展这个制度，并且在这个制度下来努力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制度符合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和意愿，因此它是有生命力的。企图在中国搞资本主义是行不通的。鼓吹在无产阶级专政下搞“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继续革命也是极为荒谬的。

## 2. 国家大

我们有960万平方公里国土面积、幅员辽阔、资源丰富。但是各地情况千差万别，经济的发展很不平衡。这是我们研究新中国经济史和进行经济工作中必须经常注意到的一个基本国情。根据我们的国情，不可能什么事情都要遍地开花，都要一刀切，全国一个样板。事实证明，凡是搞一刀切的没有不犯错误的。同时我们还要记住中国的资源是丰富的，但是要把资源勘察清楚和开发出来是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才能做到。

## 3. 人口多，而且80%的人口是在农村

人口多、劳动力资源丰富。但是人口多消费大，经济的负担也大。中国人民是勤劳勇敢的，但是科学文化水平很低。这是我们在考虑中国经济建设问题时一定要充分注意到的。既要看到人口多有好的一面、也要看到人口多在就业、生活安排、教育以及城市建设等方面所造成的困难。

## 4. 底子薄

虽然我们已经建立了相当的物质技术基础，但是同先进国家比较起来，我们的底子还是比较薄弱的。我们现在的工业技术，基本上相当于经济发达国家五十年代或六十年代初期的水平。我们现在严重缺乏管理现代化经济的经验。我们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必须充分考虑这个特点。如果背离这个特点，我们的政策就会订的不妥当。

## 5. 商品生产不发达

现在我们的农村基本上还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这两

年有所变化，但农产品的商品率还很低。我们的工业生产社会化程度也不高，缺乏明确的专业化分工，很多工厂“小而全”、“大而全”，自给自足。一个机械厂从翻砂、热加工一直到锻造全都有。这种生产状况是很落后的。工厂很大，投资很大，但是由于“大而全”的结果，生产只能小批量。

上面所说的这些基本国情，本来都是大家知道的。但是，我们在很长时间却很少对它进行认真地研究，没有很好研究这种国情对我国经济发展所产生的深刻影响，以及我们怎样根据这种国情正确建立和确定我们的经济理论、经济政策、经济计划和经济体制，因而做起事来常常忽略它、甚至违反它。

我们都读过毛主席1939年写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主席在这篇文章中曾经说过这样的话：“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根据。”当时他指出，现实的社会性质既然是一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因此中国革命的敌人是异常强大的，不但有强大的帝国主义，而且有强大的封建势力，以及和人民为敌的资产阶级反动派，那种轻视中国革命人民的敌人的力量的观点，是不正确的。在这样的敌人面前，中国革命的长期性和残酷性就发生了，那种以为中国革命力量瞬间就可以组成，中国革命斗争顷刻就可以胜利的观点，是不正确的。在这样的敌人面前，中国革命的主要方法不是和平的，而必须是武装的，也就决定了。这是毛主席根据当时中国的国情，不仅分析了我们的革命的对象，而且分析了中国革命的任务和革命的动力，分析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和革命的前途。建议大家在研究中国经济史的时候，重读毛主席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以及《论持久战》等文章，这对我们考察中国的经济问题很有

借鉴作用。毛主席在这些文章中提出的考虑问题的方法，对于我们研究中国的经济问题是完全适用的。毛主席在分析中国革命的时候是那样地深刻和明确，因而成为指导革命胜利的科学。可惜我们在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却缺乏对中国国情的这种深刻、明确的分析，因而使我们在取得很大的成功中发生了很多的失误。

### 第三节 三十二年经济建设的基本经验教训

我们党在毛主席领导下，从我国的国情出发，曾经提出了一系列正确的经济理论，规定了一系列的正确的方针和政策。主要是：

（1）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中国必须走社会主义道路；中国完全有条件建设一个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国家。这些毛主席在革命胜利后就提出来了。中国解放后走什么道路，奋斗目标是什么，有没有条件实现这个目标，主席在理论上作了明确的阐述，使我们明确了方向，增强了信心。

（2）为了使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必须对个体农业、个体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同时不断改进和完善社会主义所有制的各种形式。

（3）中国必须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只有社会生产力取得比较充分的发展，科学技术水平有较大的提高，社会主义制度才能获得巩固的物质技术基础。四个现代化必须走自己的道路。

（4）社会主义经济是计划经济，国民经济的发展必须实行计划化。因为主要生产资料掌握在国家手里，因此，我们有了实行计划化的条件。而要实现我们的目标，不搞计划

经济是不行的。

(5) 人民群众是历史发展的动力。社会主义建设必须坚持按劳分配的原则，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充分发挥我国人民的积极性、创造性和主动精神。我们的建设，脱离人民群众将一事无成。

(6) 我国人口多，办一切事业必须统筹兼顾、适当安排。

(7) 社会主义建设必须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既不能按照别人的指挥棒来行动，也不能成为外国经济的附庸，靠乞讨过日子。

以上这些理论、政策和原则都是正确的。正是由于我们坚持了这些正确的理论、政策和原则，我们才能取得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成就。这些理论、政策和原则的制定，对国家的命运和发展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但是我们在社会主义建设中也犯了很多的错误，主要是在一些方面脱离了中国的国情，提出了一些不切实际的理论、政策，并且按照这种理论政策制定了脱离实际的计划，采取的经济体制不完全符合中国经济的实际。这些失误又使我们的经济发展遭受严重的挫折。

1980年12月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云同志指出：“开国以来经济建设方面主要错误是‘左’的错误。”“1957年以前，一般情况比较好些，1958年以后‘左’的错误就严重起来了。这是主体方面的错误。”

过去长时期中我们的失误和挫折，主要表现在以下一些方面：

### 1. 在指导思想上抓错了主要矛盾

1956年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起来了，国内的主要矛盾

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本应当把工作重点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但是在指导思想上仍然强调国内的主要矛盾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不间断地搞政治运动和政治斗争，把经济建设放到了从属的地位。同时，对经济问题上的不同意见和看法，不是就经济本身的状况和因素进行科学的分析和讨论，而是动不动把经济问题提到政治领域，轻率地搞两条路线的斗争。政治上的这种一个接一个的斗争，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造成了经济建设的不稳定和大起大伏。

三十多年来我们真正能集中精力，按照经济规律搞经济工作的时间并不多。从1955年合作化运动反右倾、反保守开始，不断地搞反右运动，1958年反右倾保守，1959年反右倾机会主义，1962年再次反右倾，1966年“文化大革命”更是大反右倾。在十年动乱中不是反右倾复辟，就是反右倾回潮，再就是反右倾翻案，没完没了。虽然二十多年中也有几次反左，1956年反冒进，1959年第二次郑州会议提出反左倾冒进，1960年冬到1961年提出八字方针，实际是反左。但是，历次反左斗争都不彻底，而且是反到半截就转向反右。1956年反冒进，结果到1957年下半年就批反冒进，来了个大冒进；1959年初开始反左，庐山会议又从反左转向反右；1960年提出八字方针，商定农村政策，1962年七千人大会批评左的做法，不久又提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转向反右。从实际情况出发，应当是有左反左，有右反右，有什么反什么，而不应当作为一个运动来搞。过去长期反右，正是指导思想上“左”的表现。

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伟大历史功绩之一就是

确定了全党全国工作重点的转移，明确地规定今后除非发生战争，不能动摇把工作着重点放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的战略部署。

## 2. 过分地夸大生产关系变革的作用

既然农业已经集体化了，就应当把生产关系相对地稳定下来，积极发展生产。但是，当时在指导思想上却不顾生产力发展的水平，不断地强调变革生产关系，追求“一大二公”，追求向全面的全民所有制过渡，追求向共产主义过渡，一次又一次地刮“共产风”。刮一次，生产力就下降一次。生产力下降的时候就调整政策，而日子稍微好一点，生产有所恢复和上升，则又来刮。

由于生产关系不稳定，生产队没有自主权，社员劳动不按劳分配，因此广大社员的积极性受到挫伤，集体经济的优越性发挥不出来，以致农业生产发展缓慢，多种经营长期停滞不前。三中全会的伟大意义，就在于首先纠正了在农村生产关系问题上过去“左”的错误，端正了党的政策，解放了生产力。这个拨乱反正，意义非常重大。

## 3. 片面地强调高速度

我国人口多、底子薄，必须努力使生产有一个较快的发展。但是，也正是因为人口多，劳动生产率低，消费量大，不可能要求过急，企图在短期内创造出什么奇迹。在一个较长时期，我们没有从我们国家实际状况出发，建立长期建设的思想，而是急于求成、要求速胜。只强调有利条件，而忽视困难因素。制定计划常常不是首先对经济情况进行周密的分析，并且进行综合平衡，再来确定经济的发展速度，而是

首先确定速度和目标，要求各方面工作跟它相适应。高指标随之而来的必然是瞎指挥。高指标、瞎指挥的结果，尽管一时经济上去了，而当物力、财力失去平衡，各部门的相互关系失去协调的时候，也就是生产的正常秩序遭到破坏的时候，经济必然要随之下降。而在把速度问题同政治问题扭在一起的情况下，人们不肯在发现失调象征的时候，及时采取调整措施，因而一失调就是大失调，一调整就得大调整。

#### 4. 生产发展方针上的错误

进行生产建设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满足社会的需要，这就是必须讲求经济效益。而在片面地强调高速度的情况下，在生产发展中往往只追求数量，忽视质量，不计经济效果；片面强调基本建设在扩大再生产中的作用，忽视老企业的技术改造；过多地考虑建设的需要，忽视人民生活的逐步改善；片面强调物的作用，忽视智力开发，忽视科学教育事业的发展。这些政策都给经济的发展造成很大的危害。

由于片面强调发展速度，追求数量和产值，在产品以吨位来计算时，企业往往什么厚、什么重就生产什么；在用钱来计算时，就什么产值高生产什么。这样做的结果，造成大量产品不合销路，形成严重积压。现在我们一年的钢材产量才2,000多万吨，但是库存就达2,000万吨。库存的设备有600多亿元。库存物资中有一部分是正常储备，有相当大的部分是积压物资，型号不对路或者质量不好。

由于片面强调基本建设，不重视现有企业的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因此造成许多设备陈旧，甚至严重损坏，生产效率很低。建设方针上的这种错误，一方面使基本建设摊子铺得很大，长期不能见效，另方面使现有企业设备日益陈旧落

后，造成产品质量长期很差，消耗很高。越是这种状况，越是要扩大基本建设规模，以求得生产能力的增加，从而造成一种恶性循环。

由于过多地注意建设的需要，不注意逐步改善人民生活的需要，长时期以来积累率过高，基本建设投资安排过多。而在基本建设中，又过多地强调重工业的发展，忽视农业和轻工业的发展；过多地强调生产性的建设，忽视文教卫生、城市公用设施，职工住宅等的非生产性的建设。这样做的结果，使人民的生活不能得到相应的改善，从而严重影响了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

## 5. 只重视物的计划生产，不重视人的计划生育

我国人口原来已经很多，在一个长时期内又不注意计划生育，以致人口增长失去控制，增加过多，成为社会发展的沉重负担。

三十多年中，中国人口的出生有“两高”、“两低”。1950年到1957年是一个高峰期，这时人口的出生率是32%到38%，扣除人口死亡率，人口自然增长率是20%到24.8%。第一次人口增长比较低的是1958年到1961年，人口出生率是18—29%，人口自然增长率是4—17%。第二次人口增长的高峰期是1962到1973年，人口出生率又上升到28%到43%，自然增长率上升到21%到33%。1973年毛主席提出“人口非控制不可”。1974年以后人口又开始下降。1974年到1980年人口出生率降到18%到25%，自然增长率降到12%到17%。我国人口增长的这种状况有它经济和社会的原因，也反映了我们在人口问题上的摇摆不定，错误的“人多好办事”的理论起支配作用。

## 6. 过多地考虑当前，缺乏长远的战略思想和战略布局

这主要表现在我们考虑经济的目标多，而没有把经济、科技、社会三者有机地联系起来，因而在有些方面不是造成良性循环而是造成恶性循环。最明显的事例就是水土流失。由于我们单纯地追求农产品的产量而没有考虑资源和生态的平衡，长期破坏森林、破坏草原和植被，因此现在水土流失的问题相当严重。每年从黄河流走的泥砂就有10—20亿吨。一位外国学者看了很心痛，说流走的都是中国的“血液”。城市和农村的污染问题也越来越严重，现在已经到了不解决不行的地步。搞经济建设没有一个长远的战略思想和战略布局不行，只顾眼前的利益，几年之后危害性就暴露出来了。我们是个10亿人口的大国，经济决策必须十分慎重。我们每走一步，都要考虑周到一些、看得远一些才行。

## 7. 经济体制不完全符合经济的实际

在经济体制上，强调计划、强调集中是必要的，过去的缺点在于集中过多、统得过死。几乎全部采取国家包下来的政策，造成吃“大锅饭”和“铁饭碗”，挫伤了企业和劳动者的积极性。没有坚持在以计划经济为主的前提下，发挥市场调节的辅助作用。过多地依靠行政手段，忽视发挥经济杠杆的作用。不惜工本，不计盈亏、不讲效果、不负经济责任，什么事情都躺在国家身上，是经济体制中上述弊病的必然结果。

## 8. 在领导方法上习惯于搞一刀切，一哄而起

我们国家大，各地很不平衡，情况千差万别，经济发展

应该因地制宜，分类指导。但是，我们长期来所采取的领导方法是搞一刀切，一阵风，一个样板，一个模式。比如搞“以粮为纲”，就不管平原地区还是山区、畜牧区、林区一律都是提倡种粮食，结果粮食发展很慢，多种经营搞不起来，农民收入上不去，城市供应遇到很大困难。很多事情本来应该搞试点和试验，从中取得完整的经验，制定出完整的规程，然后再逐步地全面推开；而我们就一个号召，全国一哄而起。1958年搞人民公社，经过什么试点或试验？还不是一阵风，几十天的时间全国就“化”开了。这种领导方法的为害，实在太大了。

## 9. 忽视引进和吸收国外的先进技术

我们国家生产技术水平低，缺乏管理现代化经济的经验，应当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和有益的管理经验。解放后一个时期，帝国主义封锁我们，使我们面临许多困难。后来情况变化了，国际环境朝着有利于我国的方向转变，我们没有积极开展对外贸易，利用国际市场来取长补短，没有积极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中间，我国经济的发展几乎处于封闭半封闭的状态。这也是我国经济特别是科学技术发展缓慢的一个重要原因。

我们是一个大国，建设社会主义必需自力更生，而不能依赖外国。自力更生和国际交换是不矛盾的。拿我们自己生产的东西去出口，换取我们国内短缺的东西，引进我们需要的技术，这也是自力更生。我们必须努力发展自己的科学技术，但是没有必要什么都要自己从头做起。引进先进的技术，可以加快我国技术和经济的发展进程，增强自力更生的

能力。把自力更生和国际交换对立起来是错误的。

以上这些（实际不止这些，还有些问题这里没有讲到），是我们付出了代价所取得的经验教训，因此，是很宝贵的。为什么会产生这些问题，产生这些缺点错误，而长期得不到纠正呢？主要有三个原因：

### （1）缺乏经验。

应当承认，在中国这样一个大的而且经济落后的国家里建设社会主义，我们没有经验。我们不满足已经取得的成就，但是怎么样来改变这种状况，没有一个现成的模式可以照搬照抄。在这种情况下出现一些缺点错误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 （2）经济上的原因。

中国国家大，人口多，底子薄，社会主义建设只能稳步前进，不能急于求成；但是另外一面，因为穷，问题成堆，大量问题急待解决，而且又有国际上的侵略威胁，因此在指导思想上又容易产生急躁情绪，容易产生超越客观可能的“左”的倾向。国家大、经济落后，很多事情只能量力而行，来不得一点骄傲；但是由于国家大、人口多，又容易骄傲起来。

（3）随着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发展，在党内滋长了家长式的统治，搞一言堂、不民主、个人专断；也滋长了盲目相信，个人崇拜。因此在领导上容易做出脱离实际的主观主义的错误决断，而且不容易纠正。

三中全会和六中全会的伟大意义，就在于在这样一些重大问题上拨乱反正，认真地总结了经验，提出我们应当遵守的正确原则。没有三中全会解放思想，我们不可能取得这些正确认识，不可能做出一系列的正确规定。

### 第三章 新中国经济史的分期

《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把建国以来的历史分为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七年（1949年10月—1956年）；第二个阶段，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1957年—1966年）；第三个阶段，“文化大革命的十年（1966年5月—1976年10月）；第四个阶段，粉碎“四人帮”以后到现在（1976年10月—现在）。这是就我们党的工作重点来划分的。这样划分对于了解我们党在建国以来的历史是很必要的。

讲经济史，应当遵循这个历史阶段的划分，但要侧重于经济发展的过程。从经济工作的实际进展情况来看，我们打算分为五个阶段来讲：

第一个阶段：国民经济的迅速恢复时期（1949年10月—1952年）。这一阶段是新中国经济史中打的第一个漂亮仗，三年时间如期完成了原来预订的任务。当时我们接收下来的是一个百孔千疮的烂摊子，国外有抗美援朝的战争，国内有大量的问题，百废待兴，工作千头万绪。但是我们整个的工作进行的井井有条，比较顺利。所以在我们的经济发展史上，这个阶段应当作为一个独立的阶段。

第二个阶段：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从1953年—1957年）。这是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同时并进的时期，而在这两个方面我们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各项经济建设循序前进，各方面的关系比较协调，建设和生活的关系处理的也比较好，五年计划超额完成。这是新中国经济史中打的第二个漂亮仗。不是完美无缺，但成绩是主要的。作为经济建